

海洋区域治理视域下的 月港“二十四将”叛乱^{*}

王日根 黄友泉

内容提要 嘉靖四十年(1561)爆发于福建海澄地区、前后历时8年之久的月港“二十四将”叛乱,是明政府海洋区域控制薄弱、地方各种势力相互争胜以至失衡的结果。面对延续时间长、破坏惨烈的叛乱,各种官民力量在海澄设县事务上积极建言、悉心规划与切实施行,可以说海澄县的设立是官府加强海洋区域治理的一个标志。实践表明:政府行政力量在海洋区域治理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单纯的民间治理无法真正实现海洋区域的有序化。

关键词 海疆治理 二十四将 海澄设县

明王朝建立之初,朱元璋秉持“恢复成周”的为政理念,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里甲、老人等制度,力求实现对乡里基层社会的严密控制,但是,这种仅适用于小农经济状态下的定居式农业社会的制度并不适用于商民社会和海洋流动社会,里甲制度收效甚微,作为辅助机制的军事设置如巡海道、巡按御史亦显得软弱,行政治理越来越成为各方面期待的目标。月港“二十四将”叛乱推进了海澄设县的进程。

海澄地区行政治理的长期不到位

明代前期实行海禁与朝贡贸易相结合的海外贸易制度,严禁私人下海从事私贩贸易。在生计压迫与厚利诱惑下,海澄地区自明初便开始出现走私活动,至成弘年间,月港已呈现出“风回帆转,宝贿填舟,家家赛神,钟鼓响答,东北巨贾,竞

鹜争驰”^①的繁荣景象,成为当时最著名的走私港之一。月港“通番倡乱,貽患地方者,已非一日矣”^②,官府对此局面早有察觉,在月港“二十四将”叛乱发生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官府沿用陆地思维,推行保甲等制度,结果不适用于沿海区域,因而这一带社会动荡依然剧烈。

景泰年间,漳州府知府谢骞鉴于月港、海沧等地“民多货番为盗”,下令施行保甲制度,并拆毁违式海船,只准小船出近海生理。^③虽然他认为这是“甚切滨海之俗”^④的政策,实际上却无法在海洋环境下的海澄县内施行。对此,曾向朱纨建议推行保甲的月港士民严世显就认为,“(保甲)鲜有效者,以阻于强梁,弊于里老,且无官府以督成之,宜乎效之不终也”^⑤。指出保甲无法施行的原因在于豪强的抗拒、里老的敷衍以及官府缺乏督促。我们知道,海澄设县之前属漳州府龙溪县辖

^{*}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中国海洋文明史”(项目号:09JZD0015)的阶段性成果。

境,由于地处偏远,“龙邑鞭长不相及也”^⑥。而月港“距漳城四十里”,“请计台府,动经旬月”^⑦。这种地理上的阻隔使得推行保甲在操作上有很大的难度。由于缺乏相应的行政建制,保甲的推行只能寄办里老。在缺乏官府的督促,又有得罪乡族、抵牾势家危险的情况下,里老对保甲一事态度消极,“以讦告则不对理,以接济则带结牵连而不可解”^⑧。对此,漳州府、龙溪县无可奈何,只得“病其难治而姑息”^⑨。官员们则“率以因循迁就为自全计”^⑩。而巡按御史、巡海道对此同样无能为力,“在巡海道竟年不巡至漳,在察院按漳之日,目见其弊,则奋然欲为整顿之图,不过责人以旦夕之效”^⑪。最终,“巡历不过一年,交代则成故纸”^⑫。可见,官府力量对海澄地方的渗入严重不足,处于软弱懈怠的状态。此时当地已形成了强大的走私利益集团,走私势头强劲。对澄民而言,走私、通番乃其生路所系,推行保甲无异于断绝其生路,因而“内外合为一家”抗拒保甲^⑬,所谓“利孔所在,民以死力赴之,而卒不可禁。欲严卒伍,以限居民之出入,则小民相容为奸利,吏不得问也。问之,则匕首副其胸矣”^⑭。显然行于陆地社会的保甲制度并不适合于赖海为生、颇具流动性的海上人群。当地势家大族则因“素获下海通番之利,乘机倡祸,煽动愚民,希图阻挠宪法”^⑮。甚至恃其强势,操弄保甲。对此,朱纨已敏感地觉出,他说“保甲之法,操纵在有司则可,操纵在巨室则不可。”^⑯巨室坐拥一方,社会动员能力很强,有时甚至制造舆论,挟持官府,“威福之柄移于乡评,是非之公乱于野史,久矣”^⑰。可见,在缺乏强有力的行政支持下,保甲制度缺乏实行的土壤,势必不可能达到实际的治理效果。

除了推行保甲,官府还在海澄及其周边设置官署,希望藉此加强对当地的治理。嘉靖九年(1530)巡抚都御史胡璉将巡海道由省城移置漳州,并在海沧设立安边馆,专门捕禁下海通番之人。安边馆设置的目的在于“弭盗贼,禁通夷,理狱讼,编舟楫,举乡约,兴礼俗,大要以安民为尚”^⑱。其设置的初衷无疑是好的,然而其效果亦事与愿违,“官贪吏墨,与贼为市,乱且倍于前日”^⑲。对于馆官的贪渎,海道副使柯乔曾经指

出“安边馆通判一员管理捕务。其始也,官设八捕以擒盗;其既也,八捕买盗以通。官本以御寇,反而以导寇,本以安民,反以戕民。”^⑳安边馆出现这样的问题与其职官设置有着很大的关系。为节省经费,安边馆不设专官,而是“于列郡佐贰之中摘委”^㉑轮署馆务,且其任期很短,“半年一代”^㉒。这种官不久任、职不专属的职官设置,使得安边馆“上下皆无固心”^㉓,反而为职司弹压的安边馆官吏的贪渎创造了条件。对此,朱纨批评到,“(安边馆)更代不常,治滥数变,以致捕盗夤缘为奸”^㉔。此外,安边馆设置于距月港“二十里”的海沧,而“月港之乱,正坐官司隔远,威令不到”^㉕。这就使得安边馆“先事防察,以遏乱萌”^㉖的设立意图难以实现,更使其对月港的弹压效力大打折扣。可见,安边馆的设置不仅没能实现官府弹压当地的意图,反而加剧了当地的动荡。

综上所述,月港叛乱之前官府对当地的治理并不成功。由于缺乏必要的规范与管理,在地方势力的操控下,海洋区域社会呈现出混乱、无序的发展态势,当地社会的各种矛盾也在不断地累积。这种“积习成风,积弊成乱”^㉗的局面,最终于嘉靖四十年(1561)酿发了月港“二十四将”叛乱,海澄成为明代因走私、通番引发叛乱的典型地区。对于叛乱的发生,明人谢彬有过这么一段描述“鬻萌于通番,而遂致勾倭,祸始于募兵,而卒成为盗,重矣措置之失。宜加以凶荒之荐,至内则饒贼劫众以横行,外则倭奴破城而南下。奸雄乘机而靡起,狂狡思乱。”^㉘指出了叛乱发生之际当地混乱不堪的局面。同时,也指出了明廷在措置过程中的种种失误。

月港“二十四将”叛乱与平叛过程

月港“二十四将”叛乱看似由某种偶然因素所引发,实际上却是包含着某种必然的因素。可以说,月港“二十四将”叛乱乃是官府治理长期不到位,海洋区域社会长期无序运行的必然结果。按照叛乱的发生及平叛过程可以将叛乱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嘉靖三十六年至嘉靖四十年为叛乱酝酿阶段;嘉靖四十年为叛乱集中爆发阶段;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三年为招抚阶段;嘉靖四十三年再

次叛乱和叛乱平定阶段。

有关月港叛乱的起因,乾隆《海澄县志》记载“先是,丁巳间,九都张维等二十四人,造船接倭舶,官莫能禁。戊午冬,巡海道邵梗发兵剿捕,维等拒敌,官兵败,由是益横。”^{②9}“丁巳年”即嘉靖三十六年(1557);“戊午年”为嘉靖三十七年(1558)。也就是说,自嘉靖三十六年(1557)开始,张维等人造船通倭,嘉靖三十七年(1557)海道副使邵梗派兵剿捕。有关官府的此次剿捕行动,万历《漳州府志》记载到“(邵梗)差捕盗林春领兵三百人剿捕,次于许坑,二十四将率众拒敌,杀死官兵三名”^{③0}。可见,官方的剿捕并不成功,反而引发张维等人与官府的拒抗,由此开始了叛乱的酝酿阶段。官府剿捕失败后,张维等人的做法为更多的叛众所效仿,“张维据九都城,吴川据八都草坂,黄隆据港口城,林云据九都草尾城征头寨为最横。旬月之间,附近效尤,连络营垒,八都又有谢仓城,六七都有槐浦九寨,四五都有丰田、溪头、浮宫、霞郭四寨,互相犄角,别头目曰:二十八宿,曰三十六猛”^{③1}。

关于叛乱真正爆发的时间,各家史书均将之系于嘉靖四十年(1561),由此开始了叛乱集中爆发的阶段,而此时距张维等起事已经过去了4年。嘉靖四十年(1561),“邵海道再议发兵扑灭,榜示远近”。官府的意图在于通过榜示以离散叛众,没想到此举反而促使叛众“同力以待官兵”^{③2}。由此激化了矛盾,触发了叛乱。随后,叛众派船把守镇门,以抵挡官军进攻。同时,进兵东山、水头等处,攻破虎渡堡,并诛杀苏族90余人。随后,又流劫田尾、合浦、渐山。在进攻不利的情况下,海道副使邵梗“用以贼攻贼之计”^{③3},不惜遣金币招致海寇洪迪珍,引倭寇由陆路经诏安、漳浦,取道渐山,进攻八、九都叛众。双方战于草坂城外,倭众被击败、逃走,漳州府城由此戒严。军事剿捕不成,甚至“以贼攻贼”都未见成效,官府不得不又转剿为抚。福建巡抚谭纶“下令招抚,为羁縻之术”^{③4}。海道副使邵梗再令海防同知邓士元,龙溪丞金璧往抚,才暂时缓和了局势,由此进入了叛乱的招抚阶段。然而,就在同年,“海沧并龙溪之石尾、乌礁等处土民俱反”^{③5}。

对于双方而言,官府是出于剿捕不成才转剿为抚,招局中难免有缓兵权宜的意味。叛军虽称凶悍,实则亦只是一群乌合之众,并无远略。因此,“招抚”之策暂时促成了双方相安的局面。但是,叛众在被抚局之后并没有获得什么切实的许诺或保障,相反却受到了立保甲、编舟船等诸多限制。^{③6}于是,这种相安无事的局面并没有持续多久。不出两年后的“嘉靖四十三年,张维等复叛,巡海道周贤宣檄同知邓士元,擒解军门,斩首梟示,自是地方告宁”^{③7}。

在嘉靖四十三年(1564)月港再叛之时,官府根据当时的情势曾作出了剿抚两套方案。之所以作出抚的方案,是因为首先,月港再叛之时,响应者已较前大为减少,“今四方已息,惟八九都蟠结城堡,互为唇齿,纵恶愈甚,而方田九寨则实为八都草坂声援”^{③8}。出现这种局面不能不说是与邓士元等利用抚局先行瓦解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其次,官府清楚地看到,叛乱者乃乌合之众,不少人乃为叛众裹挟而去,“中间贫民不能远避,劫令胁从,不从者杀之”^{③9}。只要争取到叛乱头目就可离散叛众。“彼中之人虽恶,尚有一点惧怕官府之意。矧各头领俱以不义致富,闻兵将至,各颇自顾身家,特其伙党倚贫为恶,而头领无有以制之耳。若有官以任之,则为头领者有所倚仗,而去之易矣。”^{④0}有意思的是,嘉靖四十一年(1562)正月,饶贼侵扰漳城,邵梗调月港兵与战,月港人不仅奉调出战,而且还打了胜仗。也许正因为如此,官府更坚定了“招抚”的决心。最后,官府担心叛众逃逸上海沦为海寇。当时传言“月港私造双桅大船不啻一二百艘,鼓泛洪波巨浪之中,远者倭国,近者暹罗、彭亨诸夷,无所不至,甚者沿边越境劫掠商民,非一日矣。今闻大兵将至,辄谋整船只,挈载妻子,欲往海岛澎湖等处避居。不者则屯聚外澳,俟兵退复回。又不者如去岁,横溃四出,流劫乡村,以摇动漳城,此虽风闻,然势所必至”^{④1}。这种背景下,一旦剿捕方案有所闪失,叛众散出海上,再想追剿便不是那么容易的了。鉴于“山魑易扑,海寇难靖”^{④2}的局面,官府再次议剿时采取了审慎的态度。此外,对于官府来说,即使抚局不成再行剿捕也为时未晚,另外可以“招抚”

之名麻痹叛众,为剿捕争取时间、创造战机。事实上,与其说是“招抚”还不如说是“诱杀”,即在大兵压境的背景下,借招抚之名,诱至叛乱首领,将之诛杀,随后遣散叛众。

关于叛乱及平叛过程还有一点需要提及。月港叛众所占据的土堡,是因嘉靖三十五年(1556)海寇谢老引倭突犯海澄,“都御史阮鹗诚谕居民筑土堡为防御计”^⑬。“土堡之置,多因嘉靖季民罹饶贼、倭寇之苦。于是,有力者率里人依险筑堡,以防贼害。”^⑭土堡的兴筑虽称防饶、防倭,但叛众据堡为乱亦有了依凭。当叛乱发生之后,漳州沿海土堡修筑突然多了起来。“漳属土堡,旧时尚少……嘉靖辛酉以来,盗贼生发,民间围筑土围、土楼日众,沿海地方尤多。”^⑮嘉靖辛酉即嘉靖四十年(1561),这一年恰好是月港叛乱集中爆发的时候。官府劝筑土堡,本以防御海寇、倭寇,没想到却成为叛众盘踞的巢穴,而叛乱反过来又加速了当地土堡的修筑,这点恐怕是官府所始料未及的。从嘉靖年间海澄地区土堡的修筑,我们不难发现,地方动乱加速了乡村军事化进程,而这一过程对地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仅从叛乱频发这一现象看,海澄地区由动荡走向叛乱不能不说是与当地乡村军事化进程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土堡的增筑无疑又为叛众起事对抗官府创造了条件。进而言之,土堡的修筑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了叛众的行为方式,叛众未选择扬帆出奔,显然与当地有土堡为恃有着重要的关系。土堡的增筑势必影响到官府处置叛乱的方式,在叛众占据土堡的局面下,如强行进行军事剿捕的话,势必将付出巨大的代价,这可能也是官府采取“招抚”策略的原因之一。

月港“二十四将”叛乱危害甚大,“二十四将之徒,二十八宿之党蔓延接踵,充斥于闽广之交”^⑯。明人评价其“害甚于倭,南溪荆棘”^⑰,“结巢盘踞,殆同化外”^⑱。月港由此前长期走私、通番的“素号难治”之地,一下子因为叛乱而沦为“形同化外”之地。这种局面严重影响到了地方社会的秩序,官方、民间的有识之士均竭力推动着海澄的设县,即通过增设行政治所,强化对当地社会的管理。《海澄县志》记载“自是地方长宁,而

设县之议起。”^⑲

多方博弈下的海澄设县

嘉靖四十四年(1565),漳州府知府唐九德议析龙溪一至九都、二十八都第五图,合漳浦二十三都第九图置为一县。都御史汪道昆、御史王宗载上疏具奏,报可,赐名“海澄”。隆庆元年(1567),海澄县成立。^⑳实际上,福建方面奏请设县、改善当地治理的努力并非始于叛乱之后。此前几任抚按就曾多次提请设县,均因设县“事体重大”,多方利益纠葛而一直未果。嘉靖二十七年(1547),巡海道柯乔就建言于月港九都设立县治,并经巡抚都御史朱纨、巡按御史金城分别上疏奏请,然“格持议者,弗果”^㉑。嘉靖三十六年(1557),月港遭受海寇谢老洗劫,杀戮甚惨,都御史王询再次请求设县,同样未果。^㉒嘉靖四十三年(1564),回籍守制的福建巡抚谭纶上陈《善后六事》中再次提请设县,“行抚按官再议”^㉓。海澄地区曲折的设县历程以及围绕设县议题的利益博弈,展现了各方力量在海洋区域治理过程中的态度及作用。

对于明廷而言,增设新县最大的问题在于经费的筹集,这其中不仅包括了建官设署与筑城造郭的开支,还包括了后续的官员俸禄等一连串开支。此时福建因平定倭乱,地方财政早已入不敷出。即使较早设立诏安、平和县时,便因动支漳州府库贮不足,更动用泉州府空闲盐课等项。^㉔国家在置县之时必定要支付许多经费,当行政开支大于实际收益时,朝廷势必会在置县问题上采取消极态度。^㉕此外,增设新县还牵涉到秩序稳定、官民关系及新旧县在土地、赋税、徭役、水利等方面一连串的利害关系。诚如李英在《海澄设县疏》中所罗列的“官多民扰”、“县分则役重,而龙溪附郭之邑单薄不支”、“绳之以法,恐其诛官杀吏”、“官乏帑藏,民乏储蓄”等等。^㉖因此,只要是地方尚能够维持,明廷一般不会主动支持增设新县的请求,除非是在危及其统治而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而月港叛乱直接冲击了王朝治下的县治统治,直接威胁到了明廷在沿海地区的统治。因而,明廷无法再回避设县问题。事实上,相对而言,海澄与邻近旧县的利益纠葛算是比较小的。海澄设县主

要割取龙溪县版籍,而龙溪县在海澄设县问题上是比较支持的。首先,海澄“僻在山海,法令疏阔,民易为乱”^{⑤7}。龙溪县长期以来对海澄鞭长莫及,而设县无疑为龙溪县甩掉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其次,自叛乱发生后,海澄地区已经不向龙溪县缴纳赋税。“月港之徒倡乱至今,八澳数十里,民不听役,赋不登输者亦已数年,而龙溪未闻有停输并役之苦。”^{⑤8}最后,嘉靖四十四年(1565)的设县方案较之此前的设县方案,在规模上已经大大地缩小了,“不过割龙溪、漳浦十分之一耳”^{⑤9}。从而减轻了设县的阻力。因此,海澄设县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明廷的态度,而月港叛乱成为最能触动统治者神经的设县动因。

就地方官员而言,以巡抚、巡按御史为代表的地方大员,总揽地方大局,对地方弊端比较了解,亦深知设县对于改善地方治理的好处,尽管其中利益纠葛错综复杂,并且很难为明廷所批准,但是出于稳定地方统治的考虑,他们往往牵头上疏,奏请设县。而对于道、府、县官员来说,鉴于海澄难治的局面,对上司设县动议他们往往都会给予支持。如嘉靖二十七年(1548)呈请设县过程中,管带分守道右参政吴鹏、整饬兵备兼分巡漳南道僉事韩柱、漳州府知府卢璧、驻扎安边馆委官建宁府同知万炯、龙溪县知县林松等都表现得十分积极。^{⑥0}然而,设县之权并不在这些官员手中,需要明廷的批准。在设县未果的情况下,各级官员只好采取了简便易行的权宜措施,即在不大费帑币、广设官署的前提下,或移置原有官署,或增设小规模独立机构,以此填补县治未设所留下的行政空白。如移置巡海道,在海沧设立安边馆,以及后来设立的靖海馆、海防馆等均属此种权宜之计。这些因陋就简的机构设置,虽称简便易行,但其规模制约了职能的发挥,在力量上不足以弹压地方势力,反而为之所挟持,在运行上又受制于官不久任、职不专属等缺陷而弊端重重。建官置署的结果非但没能解决相应的问题,反而加剧了当地的混乱。可见,安边馆、靖海馆、海防馆的设置并不能替代设县。而月港叛乱之后,各级官员由此拥有了一个令朝廷无法拒绝的理由,并最终促成了海澄设县。

就势家大族为代表的走私利益集团而言^{⑥1},叛乱前后他们对设县的态度有着天壤之别。叛乱之前,当地势家大族与小民在走私贸易中形成一种相倚为利的关系。“龙溪、嵩屿等处,地险民犷,素以航海通番为生。其间豪右之家,往往藏匿无赖,私造巨舟,接济器食,相倚为利。”^{⑥2}除了私造大船,包庇走私。势家大族还借贷资本,坐享下海之利,“下海通番之人借其资本,籍其人船,动称某府,出入无忌,船货回还,先除原借本利,相对其余赃物平分。盖不止一年,亦不止一家矣”^{⑥3}。由于当地势家大族较深地介入到走私贸易中,甚至操控着走私贸易。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他们对诸如保甲、设县等加强地方控制的措施比较消极,甚至强烈反对。如朱纨在闽浙沿海海禁、行保甲、革渡船之时,就遭到势家大族的强烈反弹。“盖是时通番,浙江自宁波、定阳。闽自漳州月港,大率属诸贵官家,咸惴惴重足立,相与诋诬不休。”^{⑥4}而此前设县动议“格持议者,弗果”,也与势家大族的反对有莫大的关系。^{⑥5}势家大族的这种态度在叛乱之后,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究其原因就在于叛乱过程中,当地势家大族势力遭受了叛乱的涤荡。虽然海澄当地势家大族与小民在走私贸易中形成一种相倚为利关系,然而,此种合作之中又不免有势家对小民的盘剥。“闽人通番,皆自漳州月港出洋。往往诸达官家为之,强截良贾货物,驱令入舟。”^{⑥6}势家大族不仅强截商民,还质押人口,勒索重息,激化了当地的社会矛盾。“奸民阑出诚罪也,然非有形势之家为之羽翼,安得驾鸢鼯而不问?非有朱纨之富操其子母,安得制奇赢而不穷?此非独扞禁之首,而积贿焚身,倍息敛怨,亦足为盗之招。”^{⑥7}因此,在叛乱过程中,叛众乘机对曾压榨他们的势家大族进行了报复。^{⑥8}“借交报仇者杀人而无忌,质人命赎卖攫货以自封,富室挈家以麇奔”^{⑥9},便是当地势家大族在叛乱中的真实写照。同样的,上文提到的叛众诛杀苏族90余人,很可能也是叛众对掌控走私贸易的当地大族的一种报复。苏姓在当地就属于傅衣凌所说的“族大之家”,“一二三都,颜、苏二大姓之宅在焉”^{⑦0}。对此《苏氏族谱》记载到“嘉靖辛酉,乡不轨之徒乘夷乱聚党以攻苏氏之堡,杀岳

伦、岳镇等九十余人,遂火其居而剽其资,毁其宗庙而耕种其田亩,五百年一旦变为丘墟。时贼方獫狁,士奋诉父仇,竟以激乱屈死于械。”^①苏族不仅遭到叛众的诛杀,而且官府挟于叛乱势头,又治了苏族“激乱”之罪。可见,在叛乱过程中势家大族同样尝到了地方社会动荡的苦果。因此,叛乱之后,势家大族对官府加强地方控制的措施采取了比较支持、起码不反对的态度,从而减轻了设县过程的重要阻力。而走私集团中势力较小的普通商贩往往惟势家马首是瞻,失去势家大族的保护,他们的活动就更多地受到当地官府的制约,而设县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制约措施之一。

就地方居民而言,他们是地方动乱的直接受害者,因而对设县一直是比较支持的。以士民、绅老、听选官为代表的地方居民,就曾多次呈请官府设立县治。如嘉靖二十六年(1547),漳州士民蔡震就曾催请朱纨设县,绅老陈弘幹则积极参与踏勘。^②月港叛乱之后,“百姓乃相率叩阙,复以立邑请诏”^③,而其中的代表人物听选官李英、陈奎更是将月港叛乱归咎于县治之不设,“追维往昔,当年将事之臣,寝阁金城之奏,致使生民涂炭,良可痛哭流涕也”^④,共同上疏请设县治,希望通过设县来改变地方动荡的局面。

综上所述,月港叛乱在加快海澄设县进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叛乱促使明廷改变此前消极、敷衍的态度,转而支持设县,希望以此来强化对当地的治理,稳定对沿海的统治。对此,官修史书也毫不隐讳地指出,“设福建海澄、宁洋二县,以其地多盗故也”^⑤。而叛乱本身则成为地方恶势力的一次大汇演,是对明廷东南海疆治理薄弱的一次示威,明廷对此当然不能漠然处之,通过设县加强官府的影响力,重建地方社会秩序就显得尤其必要。可以说,月港叛乱的发生与平定直接促成了海澄设县,海澄县的设立填补了当地在行政建制上的空缺,扭转了此前官府势力虚弱的局面,对加强官府的治理,结束当地社会的无序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对此,明人姜宝评价到,“漳之月港向为倭奴窟穴,今改设海澄县,于防御亦为得策矣”^⑥。明人郭造卿亦指出,“历考闽属,自国朝来,每因倭乱,设县即定……及近日宁洋、海澄,

而无不定者。”^⑦肯定了海澄设县对于稳定地方统治的效果。

结 语

月港“二十四将”叛乱可以说是明代海洋区域治理的一个失败案例。叛乱的发生与明廷治理不到位及海洋社会无序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当地行政建制的不足,导致官府力量的虚弱,面对海澄长期的走私、通番势头,“所司法绳不能止”^⑧,仅能一味“畏难推避,因循废弛”^⑨;而当地官员则“非病于因循,则夺于势力”^⑩,最终为地方势力所裹挟。由于长期缺乏必要的管理和规范,地方社会呈现出更加混乱和无序的状态。同时,官府也错过了规范海外贸易的时机,“奸人阴开其利窦,而官人不得显收其利权”^⑪,最终使得海外贸易利权为地方势力所把持。在无序的竞争中,社会阶层的对立与矛盾日渐加剧。对此,闽县知县仇俊卿就指出,“(漳泉)边海之人贪利无厌,强暴弱,智吞愚,不免群聚为奸,势所必至”^⑫。最终海澄地区酿发了叛乱。由此可见,必要的规范和管理是必不可少的,单纯的民间治理无法真正实现海洋区域的有序化。

反过来,月港的叛乱对明代后期海疆政策的走向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长期以来,学界一直都将月港叛乱作为一次普通的海商反海禁斗争,淡化了其沿海叛乱的本质。事实上,月港叛乱作为一次海洋区域的叛乱活动,其历时之久、参与之众、蔓延之广,沿海的通番、接济,或者海寇袭扰都不能与之等量齐观。更为重要的是,月港叛乱源发于陆地,并始终以陆地为据点,这标志着沿海动荡有向叛乱升级的苗头,由此引发固持重陆轻海观念的明廷的深切关注。为此,明廷不得不开放海禁,试图消除沿海动荡的根源。关于明廷开禁意图,明人邓钟就说,“故海澄之开禁,凡以除中国之害也”^⑬。而王在晋则更是直接地指出,“准其纳饷过洋,既裕足食之计,实寓弭盗之术。”^⑭而陈子贞亦曾指出,“有禁然不绝其贸易之路者,要以弥其穷蹙易乱之心。”^⑮可见,明廷开禁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平息盗寇,这无疑与标志着沿海动荡升级的月港叛乱有着很大关系。可以说,

在倭患基本平定与开禁呼声高涨的背景下,月港叛乱直接推动了明廷开放海禁。

- ①梁兆阳修:(崇祯《海澄县志》卷一《风土志·风俗考》,《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35页。
-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梁兆阳修:(崇祯《海澄县志》卷一《輿地志·建置》,《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19、319、319、318、318、318、318、318页。
- ③罗青霄等修:(万历《漳州府志》卷四《漳州府·秩官志·名宦》《谢蹇传》,吴相湘主编《明代方志选》(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版,第82~83页。
- 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朱纨《暨余杂集》卷二《阅视海防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8册,齐鲁书社1999年版,第26、27、24、24、24、27、24、26、22页。
- ⑥柯挺《周侯新开水门碑记》,陈瑛修:(乾隆《海澄县志》卷二《艺文志》,《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第30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67页。
- 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林魁《安边馆记》,载梁兆阳修:(崇祯《海澄县志》卷一七《艺文志二》,《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02、502、502、502页。
- 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朱纨《暨余杂集》卷三《增设县治以安地方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8册,齐鲁书社1999年版,第57、57、57、58、58、57、57、58页。
- ⑪俞大猷撰,廖渊泉、张吉昌点校《正气堂全集》之《正气堂集》卷二《呈福建军门秋匡朱公揭》,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93页。
- ⑬张萱《西园见闻录》卷五七《兵部六·海防前》,哈佛燕京学社1940年版,第6页。
- ⑮朱纨《暨余杂集》卷八《公移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8册,齐鲁书社1999年版,第196页。
- ⑲谢彬《剿抚事宜议》,载梁兆阳修:(崇祯《海澄县志》卷一七《艺文志四》,《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27页。
- ⑳郑若曾撰,李致忠点校《筹海图编》卷四《福建事宜》,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80~281页。
- ㉑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李英《请设县治疏》,载陈瑛修:(乾隆《海澄县志》卷二《艺文志》,《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第30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2、242、242、241~242、242、242、242页。
- ㉓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谢彬《邓公抚澄德政碑》,载梁兆阳修:(崇祯《海澄县志》卷一七《艺文志二》,《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04、504、504页。
- ㉕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陈瑛修:(乾隆《海澄县志》卷一八《寇乱》,《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第30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12、212、212、212、212页。
- ㉗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罗青霄等修:(万历《漳州府志》卷三〇《兵乱》,吴相湘主编《明代方志选》(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版,第661、661、661页。
- ㉘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张燮著,谢方点校《东西洋考》卷六《外纪考·日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16页。
- ㉙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谢彬《剿抚事宜议》,载梁兆阳修:(崇祯《海澄县志》卷一七《艺文志四》,第526~527、527、526页。
- ㉚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蓝鼎元《鹿洲全集·鹿洲初集》卷一《兵事志总论》,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25页。
- ㉛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黄超云校注《镇海卫志校注》《土堡》,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4页。
- ㉜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漳州府》(不分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72册,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475页。
- ㉝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吕旻《新建海澄县城碑记》,载梁兆阳修:(崇祯《海澄县志》卷一七《艺文志二·碑记》,《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06页。
- ㉞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明世宗实录》卷五三八,“嘉靖四十三年九月丁未”条,第8719、8719页。
- ㉟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韩]元廷植《明代中期福建省建置新县的理想与现实》载《第九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暨傅衣凌教授诞辰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5页。
- ㊱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傅衣凌先生曾将明代福建海商的构成分子及其出身阶级,大体分为两个类型。一类是被传统的封建关系所排斥出来的地方贫民;一类是和地方传统关系有着亲密结托的人物。对于后者,傅先生又将其细化为三种人物:一为有政治力量的势豪;一为族大之家;一为以儒治贾者。参见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四章《明代福建海商》,中华书局2007年版。
- ㊲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明世宗实录》卷一八九,“嘉靖十五年七月壬午”条,第3997页。
- ㊳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五《沿海倭乱》第三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846页。
- ㊴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有关福建势族对海禁政策的因应可参见王日根著《明清民间社会的秩序》第五章第二部分《“外患纷起”与明清福建家族的建设》,岳麓书社2003年版。
- ㊵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佚名《嘉靖东南平倭通录》,载《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倭变事略》,上海书店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
- ㊶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王在晋《海防纂要》卷一《福建事宜·福建备倭议》,《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74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669页。
- ㊷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日本学者片山诚二郎就认为将月港“二十四将”叛乱实际上是地方中小商人力图挣脱官府和乡绅的盘剥,“自立”地进行海外贸易的一种反抗斗争。参见片山城二郎《明代私人海上贸易的发展与漳州月港一月港“二十四将”的叛乱》,耿昇译,《暨南史学》(第二辑),第310页。
- ㊸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梁兆阳修:(崇祯《海澄县志》卷一《輿地志》,“青礁”条,《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第 325 页。

- ①《苏氏族谱·赠苏君士奋两赴阙复仇概膺冠带序》,笔者按:引文中虽未提及苏族操控走私、通番,但是鉴于走私、通番为明廷所明令禁止,而苏家正坐叛众屠杀,四处申告,族谱中不提操控走私一事并不难理解。
- ②罗青霄等修:《万历《漳州府志》卷三〇《海澄县》,第 660 页。
- ③《明世宗实录》卷五六六,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甲午条,第 9062 页。
- ④姜宝《议防倭》,《明经世文编》卷三八三,第五册,中华书局 1962 年影印本,第 4153 页。
- ⑤郭造卿《闽中分处郡县议》,《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172 册,齐鲁书社 1996 年版,第 430 页。
- ⑥张燮著,谢方点校《东西洋考》卷七《饷税考》,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第 131 页。

- ⑦郑若曾撰,李致忠点校《筹海图编》卷四《福建事宜》,第 280~281 页。
- ⑧谢杰《虔台倭纂》卷上《倭利》,郑振铎辑《玄览堂丛书续集》第 17 册,国立中央图书馆影印本 1947 年版,第 21 页。
- ⑨王在晋《海防纂要》卷一《福建事宜·海禁》,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663 页。
- ⑩《明神宗实录》卷四七六,万历三十八年冬十月丙戌条,第 8987 页。

作者简介:王日根,1964 年生,历史学博士,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黄友泉,1979 年生,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潘 清)

《招魂》新诂一则

张学城

《招魂》:“二八侍宿,射递代些。九侯淑女,多迅众些。”对于这句诗的解读,历来分歧迭出。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射,厌也。《诗》云:服之无射。递,更也。言使好女十六人,侍君宴宿,意有厌倦,则使更相代也。或曰:夕递代。夕,暮也。”王逸训射为厌,又“或曰‘夕递代。’”可知当时的王逸对于这句话的解释也是拿捏不准。而后世学者对于他的这个训“射”为“厌”的解释多有异议。胡文英“旧谓射为厌,夫可憎之物,岂容来前,好恶无常,亦非正理也。”王泗原“旧注徒以射有亦音,厌也有亦音(於叶切,叶韵)牵附厌的厌倦或厌烦义,故王逸以为‘意有厌倦’,五臣以为‘君或猷之’,然而这里的射不当是这义。”

由于《招魂》作于先秦,文中多用楚语,解读楚辞所需的文献证据比较匮乏,因此一直以来对这句诗的解读众说纷纭,难成确诂。

所幸的是,近年来发现的大批竹简可以为我们解读楚辞提供有益的线索和证据。目前所发现的楚简,其年代大致上与楚辞(不包括汉人模拟之作)的创作年代相当。且同为楚地文献,某些内容之间可以相互印证。请看下面的例子:

《上博简(四)·柬大王泊旱》:“王以告相徙与中余:‘今夕不谷梦若此,何?’相徙、中余谢曰‘王当以问太宰

晋侯。’”

《清华简(一)·楚居》“中余起祸,焉徙袭肥遗。邦大瘠,焉徙居郢郢?”

上述简文,均出现“中余”一词,陈伟先生在《新出楚简研读》中指出“中余,当即古书中的‘中谢’或‘中射’。”《吕氏春秋》、《史记》、《韩非子》等古籍中多次出现“中射(谢)。”“中射(谢)”乃楚官,其职掌大致相当于侍御之官。余、射、谢古音相近,可相通假。《诗·大雅·崧高》:“既入于谢”,《楚辞·七谏》王逸注“谢”即引作“徐”。王逸乃南阳宜城人,宜城古为楚地,故王逸《楚辞章句》保留了许多楚语成分。王逸引“谢”作“徐”,楚简中“谢”、“徐”通用,可知在战国楚语中,余、徐和射可以通假。

受此启发,我们认为《招魂》此处的“射递代”,应该读作“徐递代”。《说文·彳部》:“徐,安行也。”所谓“徐递代”即是“安静、舒缓地更替”。正与上文“二八侍宿”相对应。君已安歇,众侍女轮番侍宿,须安步徐行,以免打搅休息。后汉傅毅有《舞赋》,言楚襄王、宋玉之事,赋中有云:“于是郑女出进。二八徐侍。姣服极丽,姁媮致态。”(《文选》卷第一七)其中“二八徐侍”之语,正可作为“二八侍宿,徐递代些”的另一佐证。